

· 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之六 ·

请勿翻印

请勿外传

毛主席语录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

天津的洋行买办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内部参考)

天津市政协秘书处编印

一九七五年八月

毛主席语录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天津的洋行买办

· 目 录 ·

一、中国买办的起源·····	1
二、天津外商洋行概况·····	3
三、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和买办制度·····	6
四、天津洋行买办的阶级特点·····	11
1.甘心认贼作父，充当外国资本家的 奴才和走狗·····	11
2.和军阀官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3
3.残酷剥削人民，疯狂掠夺财富·····	14
4.寄生性与腐朽性·····	16
5.封建性与落后性·····	18
五、买办制度的变迁和消亡·····	20
附注·····	22

一、中国买办的起源

买办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走狗和代理人，又是封建势力的热心支持者和维护者。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指定广州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由政府批准的牙行（即行商）专门承揽中国进出口贸易，作为中外商人的交易媒介。这就是历史上的“广东十三行”，亦即买办的前身。

早期到中国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对那些在广州商馆中专门替外国商人办理驳运、伙食、经管银钱出纳和杂务的中国办事人员称为“Comprador”，是从葡文“Comprar”转化而来，即采买的意思。“Comprador”即采买者。

鸦片战争后，废止了十三行，准许外商自由物色买办做他们的代理人。这时买办的概念有了发展，它不再是单纯的“采买者”或“采办员”，而是在中国从事经济侵略活动的外商企业所延揽或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外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特别是鸦片输入，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加之，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也有力地阻碍

着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所以中外贸易一时难于打开。

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保持着落后的封建经济的被侵略国家，一方面凭借廉价商品的优势，通过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逐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从中国人里面找到少数甘心为虎作伥的败类，利用他们做工具，来欺骗和引诱中国商民，以缓和与排除中国人民的抵抗，把侵略势力深入农村，竭力使中国经济向有利于帝国主义操纵和控制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两方面，都需要借助于买办。中国的买办制度就是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外商洋行、银行纷纷侵入，买办队伍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买办阶级和买办制度。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九四年，中国各通商口岸的买办就已有一万人左右，其佣金等收入从低估计约达四亿两。〔注1〕

后来对于凡是从事于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中国人，如号称“洋务派”的买办化官僚，为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向帝国主义买军火、借外债的经手人，帮助帝国主义推销鸦片、推销军火的经纪人，在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之间勾结联络的政客，以及宣扬和贩卖帝国主义文化的捐客等等，社会上都称之为买办。由此，买办这一名词，已经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走狗的通称。

二、天津外商洋行概况

解放前的百余年中，天津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重要据点之一。一八六〇年英国侵占租界以后，洋行陆续涌入。英国水手高林开设的高林洋行，是最早的一家。其后怡和、太古、新泰兴、仁记均以贩运鸦片起家；后来怡和、太古垄断了天津航运及食糖、面粉进口；隆茂、平和垄断了羊毛出口；新泰兴垄断了西宁毛和草帽辫出口；仁记更设有专门机构，骗运大批华工出口，卖给外国资本家做苦役，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

英商亚细亚油行和美商美孚、德士古合称“三大油行”，是英美垄断财阀在中国垄断煤油销售的三条大吸血管。

德商洋行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是天津洋行中的另一股庞大势力，以贩卖军火、机器、颜料为主。主要的军火商有礼和、美最时、禅臣、捷成、瑞记等。颜料的垄断者是德孚公司。

日本洋行在辛亥革命以后大规模来津，倾销商品和搜购资源的范围极广，进口物品有棉纱棉布、五金、机器及药品、百货，出口物资以棉花为大宗。主要的洋行有三井、三菱、武斋、加藤、大仓、东洋拓殖、东洋棉花等。

俄国洋行侵入天津较早，萨宝石出口茶砖，古宝财出

口皮毛，阜昌、隆昌以进口红布(俗称“俄国标”)为主。这些俄国侵略者还打着洋行的招牌，以不平等条约特权为掩护，在我国内地贩运鸦片和红花、鹿茸、麝香等贵重药品，攫取暴利。

此外，还有以进口机器、出口猪鬃、蛋黄为主的法商永兴、立兴；以进口汽车为主的美商公懋、美丰等，都是外商洋行中规模较大的。

外国银行最早来天津设行的是英商汇丰银行(一八八二年)和麦加利银行(一八九五年)，俄商华俄道胜银行，其后是德商德华银行(一八九七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八九八年)，法商东方汇理(一八九九年)，美商花旗(一九一六年)、大通(一九二九年)，比商华比等接踵而来，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控制网。这些帝国主义银行依靠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收存勒索来的战争赔款，转化为金融资本，代收关税、盐税，以及滥发钞票等等手段，垄断和破坏中国的金融财政，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天津的外商洋行、银行最多的时候达两千多家。〔注2〕近百年来，他们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绝非数字所能表达。在这些外商洋行、银行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买办实为主要的帮凶。

例如早期经营出口的外商洋行，根据不平等条约，享受关税特权。他们收购各种土产原料，只交纳一次税款(相当海关出口税的半数，一般的低于货价的2.5%)，名为子

口税。外商通过取得海关所发给的“三联单”，〔注3〕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转运各地，免交一切税金。外商这种特权只有通过买办才能实现。他们自己深入内地收购土产原料，有许多不便。买办作为外商洋行的代理人，在产区城乡各地遍设外庄，就近以低价收购，形成垄断，大量搜刮出口物资，残酷剥削农牧民，为外商攫取巨额利润。

又如进口煤油的英美三大油行与进口颜料的德孚公司，都是依靠数以千计的经销机构，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城市深入到广大农村，垄断销售市场。大大小小的包销、代销商人，实际上都是变相的买办。

三、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和买办制度

天津从有洋行时起就有买办。早期的买办中影响较大的是所谓“四大买办”，即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英商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由德商泰来洋行转入俄商华俄道胜银行又转入德商礼和洋行的买办王铭槐，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

这“四大买办”都来自上海。梁炎卿来于1874年，王铭槐、吴调卿来于1880年，郑翼之来于1881年。梁和郑是广东帮买办的头子，王铭槐是宁波帮买办头子，吴调卿则是官僚化买办的典型代表。

1900年，庚子战役之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买办队伍逐渐扩大。除广东帮、宁波帮外，天津本地商人、外商的雇员、以及接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大批加入买办的队伍，形成所谓“北帮”。例如英商新泰兴洋行买办宁星普，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英商仁记洋行买办李辅臣，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杜克臣，德商礼和洋行与捷成洋行的军火买办雍剑秋等，都是臭名昭著的。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从金融贸易扩展到工矿企业，这方面也出现了买办，其代表人物是井陘煤矿津保售煤处的总经理（即买办）高星桥。

上述天津的早期买办大体上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在外国教会学校受奴化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投入外国洋行当职员，当买办。如梁炎卿是香港皇仁书院毕业，雍剑秋是新加坡大学毕业。

第二种是外商洋行的练习生或杂役人员，由于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及熟悉一部分业务，提升为职员，逐步升为买办。如郑翼之原是上海太古洋行练习生，吴调卿原是上海汇丰银行马车夫，高星桥原是井陘煤矿司磅员，李辅臣原是仁记洋行杂役，王桂山原是美最时洋行德国经理的厨司等。

第三种是由商人转为买办。如王铭槐原是上海老顺记五金号的职员，后入德商泰来洋行当买办。魏信臣原是自己开设永盛姜厂的资本家，转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作为雇员，以后充当该行买办。

此外，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化的官僚，实际也干着买办的勾当。

洋行选择买办的条件是“老实可靠、俯首听命”，死心塌地给外国人当走狗，当奴才。据买办郑翼之、梁炎卿的子女们记述，买办“有无文化，外国人毫无兴趣。特别在英国洋行，一个买办的深沉老实，比精干敏捷更合乎他们的要求”。“在外国侵略者看来，毫无特长正是他的特长，是一个最合乎理想的买办的品质”。〔注4〕

早期买办制度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各点：

1. 买办与洋行签订买办合同。买办须向外商提供经

济保证,名“寄库金”(俗称“押拒”),作为中国买主或卖主可能发生毁约或亏欠情形时的抵偿。这种寄库金最后有的增加到几十万两。〔注5〕但外商对买办并不提供任何保证。

现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与买办魏信臣所签订的买办合同内容摘录如下:

(1) 该买办经办业务,必须对行方忠实,代行方保密,并须努力促进行方业务之繁荣。

(2) 该买办在签订合同前,须存交行方寄库金白银三万两,以担保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并作为弥补损失款项之用。这项寄库金,行方可以随时提取,或专拨行方之用。

(3) 出具保证书人(由三家商号负责人出面保证,保证金额共二十五万两)如有死亡、破产或离津时,该买办须立即另觅行方同意之人继为担保。如两个月内未能办到,行方即将合同作废,不另通知。

(4) 行方如认为需要增加寄库金和保证书的金额,该买办必须尽量增加至行方满意为止。

(5) 双方均可停止合同,但须于六个月前通知。如该买办犯有不诚实、欺诈之罪,或违反规定,疏于职责,行方可以辞退,不另通知。

(6) 该买办必须自费准备至少四个收款员,及其他雇员、工人,并对一切行为负责。

2. 买办的公事房名为“华账房”,是洋行的附属部分。买办接受外商发给的津贴,又在买卖成交时提取佣金。买办的收益牢牢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迫使买办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

3. 帝国主义利用买办为他们推销商品,搜刮资源,集聚中国分散的资金,剥削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从各个

渠道掠夺中国的财富。

4. 买办依仗帝国主义的特权，勾结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势力，取得官职，提高了社会地位，帝国主义又利用他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

买办和外国资本家的关系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买办完全依附于外商。只有对主子绝对忠诚、驯服，并不顾一切地为他们的外国主子去剥削、掠夺中国人民，给外国主子赚取巨额利润，他们自己才能分沾一部分利润，并巩固他们的地位。

洋行给买办的固定报酬很低，每月贴费数十两到数百两，但佣金则按成交额计算，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收入，加上他们自己的经营，最多的每月收入可达数万两至数十万两。如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的买办收入，据其子女所作的统计，约有以下各项名目：

(1) 替洋行的船只揽载，所得佣金，称为保证佣金 (Guarantee Commission)；

(2) 船上买办偷运、走私、舞弊所得，要分给洋行买办一份；

(3) 客户为求得某种便利，向买办公开行贿，俗称“使费”；

(4) 货物保险费回扣，损失赔偿的回扣；

(5) 倒卖客户已到的进口货，随高价出售，以船运误期搪塞客户，或用其他客户的来货顶替。赚钱之后再给原客户重新订购一份补交；

(6) 外商提供国外市场货价重大变化的消息，买办自己不愿担风险时，可以透露给客户。客户如因此而获利，买办坐分一份；

(7) 买办自己经营房地产买卖出租及购买外国企业的股票等。

积累数十年，不少人成为富豪。据估计，梁炎卿的财产约值二千万元，郑翼之约一千余万元。其余财产在百万以上的更多。

四、天津洋行买办的阶级特点

天津的洋行买办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封建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现有的部份资料来分析，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甘心认贼作父，充当外国人的奴才和走狗

当买办，就是仗外国人的势力，掠夺中国的财富。替外国主子搜刮的越多，自己分沾的越多。买办完全是外国资本家所豢养的奴才和走狗。为了得到外国人赏赐的金钱，百般献媚，毫无羞耻，根本谈不到国家民族的气节。为了讨好外国主子和自己大发横财，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庚子之后，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当时侵略军“都统衙门”的文案、后来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孙仲英，带领洋兵搜捕义和团战士，烧杀劫掠无所不为，还借外国侵略军的势力，盗卖长芦盐坨，大发国难财。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利用他在清政府担任官职，甘心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密探，当他探听到义和团准备炮击英租界打包公司

厂房时，立即密告英国领事，集中该厂内的外国人数百名及时转移。帝国主义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的庚子赔款，吴调卿从中分得五十万两白银，还获得英皇赏给的“维多利亚勋章”。买办梁炎卿、郑翼之、李辅臣、庄乐峰等都开出“损失单”，附在外商洋行后面，向清政府索取数万两至数十万两不等的庚子赔款。依仗外国人的势力，掠夺本国的财富。

第一次欧战时，德国发行“爱国公债”，动员在中国居住的德国侨民购买。恬不知耻的买办高星桥竟然也购买了一笔不是他自己国家的“爱国公债”，因此受到德皇赏给“冯（von）”（德国贵族姓氏前的尊号）的称号。高星桥还把德皇威廉二世的大幅象片高悬客厅正中，把他儿子的乳名叫作“柏林”，以示“感恩”。当时投靠德商充当军火买办的王铭槐，因欧战爆发，对德贸易停顿，而“痛心万分，日夜祷祝德国的胜利……”，〔注6〕充分暴露了买办认贼作父的奴才相，令人发指。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天津各界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不使用外币，爆发了向外商银行挤兑的运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遭到巨大的冲击，眼看即将倒闭，该行买办魏信臣竟拚命代为奔走，向中国银行借来几十万银元，使正金银行顺利渡过了挤兑的危机。魏信臣实际上成为天津人民反帝爱国革命运动的破坏者，一个毫无中国人气味的

民族败类。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以后，一部分买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如开设宝源隆和福民公司的谢吕西，在日本驻津1820部队支持下，深入华北内地，搜刮军用物资；日本大仓洋行买办孙治庭，拜日本特务机关长雨宫为义父，凭借雨宫势力，在正金银行透支大批款项，作为代日寇搜刮物资的活动经费。这些人已经堕落成为贩卖祖国的汉奸卖国贼。

2. 和军阀官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买办既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又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媒介。天津的洋行买办中有不少人与封建军阀官僚有密切的关系。

在清朝，很多大买办为了便于勾结上层官僚，招揽生意，在清政府捐过官衔，梁炎卿捐过“头品顶戴”，郑翼之和王铭槐都捐过二品职衔的候补道。吴调卿由于李鸿章的援引，逐步挤入官场，曾任淮军银钱所总办、关内外铁路局总办等职。在他任职期间，所有修筑铁路的款项都由汇丰银行借贷，所有路轨、机车器材都通过英商洋行购买。名义上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干的仍是买办勾当，是个典型的官僚化的买办。

王铭槐靠李鸿章的援引，充当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

又与军阀拜把子，拉关系，充当德商洋行的军火买办。军火买办雍剑秋，用赠送步枪、大炮的办法，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注7〕并向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行贿数十万，取得了一个时期由德国艾哈德兵工厂出售军火的专利，做成几笔大的生意。袁世凯借此镇压南方的革命活动，雍剑秋从中赚取了巨额的回佣，而德国政府达到了影响军阀政权、扑灭革命势力的目的。

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清末捐了一个“五品升衔双月选用銓與卫经历”的官衔，借以出入王公权贵之门，结识了庆王奕劻及其子载振等，代办存款放款，买卖房产。清内务府大臣增崇，兵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那桐，都托魏信臣代办存款。溥仪被逐居津时，也以大宗款项托魏信臣代存各外商银行。北洋军阀段芝贵、倪嗣冲、王郅隆等，都是魏家的赌客。一九一五年，正金银行买办吴洁南经魏引荐，以赌友关系，由段芝贵委任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一九一七年倪嗣冲、王郅隆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时，魏信臣又推荐正金银行华账房大同事阮寿岩为该行经理。

3. 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疯狂掠夺财富

买办依仗帝国主义特权，对自己同胞残酷地压榨剥削，手段狠毒，无孔不入。早期的外商洋行如太古、怡和，主要是贩运鸦片。买办们靠推销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